

王以哲

东北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冰行者

董勇

1936年11月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做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孤立深入之右路第七十八师的部署。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山城堡以南待机;第十五军团一部诱敌东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主力于山城堡东南地区、第三十一军于山城堡以北地区隐蔽待机;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刘志丹旧部第八十一师等部署在洪德城、环县以西地区做样子,迟滞东北军六十七军和骑兵军。

就在彭德怀调兵遣将准备对付来敌之际,胡宗南指挥的左路军正匆匆投奔彭德怀布下的口袋。远在洛阳的蒋介石从空军得知东北军前行的事实后勃然大怒,一再催令王以哲属下各部加速进军。王以哲立即命令各师关闭电台,随即以联络不上为借口,不下达进军命令,不再理会蒋介石。

此时,大雪纷飞,天气严寒,胡宗南的“中央军”向山城堡逼近。一路上极其困难,没有柴草,没有粮食,连饮用水都没有。11月20日,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第四六四团先行进入山城堡,发现这一带已经是“居民逃避,十室九空,给养柴草,无处购买,而地区辽阔,人烟稀少,道路困难,后方兵站又不能追送,前方部队时虞断炊,实以严重问题也”。听说山城堡有一处大水泉,可以供数千人饮用,所以他们决定在山城堡宿营。

11月21日,第七十八师的后续部队第二三四旅的一个团也开入山城堡。红军的机会终于来了,彭德怀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及军团长左权决定强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杨得志看出敌方临时构筑的土木碉堡工事之间相距很远,无法互相支援的破绽,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以火力掩护爆破小分队逐个将碉堡工事炸掉。山城堡敌军大部分阵地被红军攻陷,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要全部拔除敌方工事也颇不容易,双方激战到黄昏,互有伤亡。

被困山城堡的“中央军”紧急呼救。胡宗南闻讯,大吃一惊,随即向王以哲部求援,但王以哲诉苦道:“因前进部队采用无线电静默,自己已和前方部队失去联络,无法知道自己各师在哪里,无法下达命令。”又饥又渴且弹药就要耗尽的敌军决定突围。

放弃阵地的“中央军”遭到红一军团第一师、第四师和红三十一军主力连夜突袭,最后被包围在山城堡西北的山谷中。此时,他们连简易的工事也没有了。经一夜战斗,七十八师主力几乎被全歼,大量武器弹药被红军缴获。此役,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对国内和平的实现起到促进作用。

山城堡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仗,也是红军长征和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他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成功实践,在红军和中国

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西安事变中,王以哲是主要参与策划和实施者之一。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发生内讧,爆发了“战”与“和”的激烈争论。东北军部分少壮派军人反对与南京政府和谈,主张拼死一战,而部分元老派将领从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团结以杨虎城、王以哲为首的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维护“三位一体”,稳定西北大局。

因王以哲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主张,与红军代表团同心协力,所以他成为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联合的核心,也成为极少数野心分子篡夺军权的最大障碍。

1937年2月2日,在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发动的变乱中,王以哲遇害牺牲。他牺牲后不久,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全国共同抗日局面形成。王以哲作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和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卒年42岁。

此后,关于王以哲是中共“特别党员”一事长期湮灭不闻,甚至一些曾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都不知情,直到1980年代初,在叶剑英等证实下才得以澄清。王以哲作为东北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冰行者,毛泽东曾作出高度评价:“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

(连载三·全文完)

陕甘边区首次发行的红色货币

周铁钧



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陕甘边区开辟出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中金照的三路游击区,建立起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游击战的新局面。

1934年11月4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选举产生了边区工农民主政府,设立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为繁荣地方贸易、发展边区经济,在南梁荔园堡和白马庙兴办了逢农历初一、十一和二十一的农贸大集,十里八村的百姓、商贩纷纷带着粮棉、蛋菜、禽畜和各种土特产品前来交易,没多久,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国统区”)的商人也贩来各种生活物品、农用器具等,大集每次开市都人头攒动、熙来攘往、买卖兴隆。

但过了一段时间,大集却逐渐萧条,商人也日趋减少,交易量急剧下滑。对此情况,财政委员会迅速派人查找原因,发现问题主要出在货币上。当时,边区除流通银圆,也使用国民党当局、军阀、票号发行的各种纸币。但“国统区”的社会动荡、经济不稳,货币经常贬值,今天到手的钞票,明天就可能变成废纸,让民众对其极不信任,只有银圆的价值稳定、信誉度高。所以在农贸大集上除了小买小卖、找零钱不得不用纸币,几乎是银圆交易。

但是,大集的火爆兴旺,引来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他们在出入边区的必经之路增设关卡、严加盘查,发现携带银圆就以“通匪”为由强行没收。商人害怕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劫走,就不敢再来边区大集做生意。

为打破敌人封锁,重新繁荣集市,民主政府成立了边区银行,承担发行货币、办理兑换等职责,同时将印制货币的任务交给了具有雕刻、绘画技艺的政府人员高名山和邵凤麟、邵凤来兄弟。3人在没有印刷设备和适用纸张的艰苦条件下,经反复研究、试验,采用木刻制版、在麻布上色套彩印,用桐油浸润、烘干的方法,印出质地柔韧、抗折耐磨,面值一角、二角、五角3种油布币,是陕甘边区首次发行的红色货币。

油布币上端印“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7字,下端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字样,两边印“提高工农生活”“随时兑换现金”,并加盖正、副行长印章。票面有3枚五星,正中大小五星内绘镰刀铁锤,盖有陕甘边区银行印章,油布币刚进入市场时流通并不顺利,民众对印制简单的油布币疑虑重重,都不敢使用。为打消民众的顾虑,财政委员会成立了贸易货栈,备足粮棉油盐、锅碗瓢盆、镰锄犁等生活物品和农用器具,专收油布币出售。民主政府也安排工作人员,在集市上用油布币采购商品。边区银行同时在集市上和荔园堡设立了4个兑换点,1块钱油布币可直接兑换1块银圆。

老百姓看到油布币不但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还可随时兑换银圆,就纷纷尝试使用。“国统区”的商贩见边区大集又开始红火,油布币不但价值稳定且方便携带,许多人便买通了“关卡”,源源不断地运来各类货物,收取油布币出售,然后换回银元,不但活跃了市场、繁荣了贸易,促进了流通,也缓解了边区政府和红军后勤补给的压力。

油布币流通半年多后,陕甘革命根据地日趋扩大,边区经济不断发展,油布币开始不适应市场需求,民主政府决定发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逐渐取代了油布币。

陕甘边区首次发行的红色货币虽流通时间短、使用范围小,但它为推动边区贸易、改善民众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稳固陕甘边区民主政权、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金融事业积累下宝贵经验。

一颗匠心读钮雕

王家年

珍赏

印章之钮也称钮雕,特指印章上部的雕刻,起装饰印章的作用,明清时期大盛行。明初民间大量使用印章,许多文人发现可用天然石色美化印章。起初仅是在“印鼻子”上简单穿洞,后来发展成为在印章上部的平台进行雕刻装饰。特别是明、清后,印钮雕刻艺术突飞猛进。雕刻手法更加精美而富有变化,雕刻内容更加丰富,印钮也从简单的纹饰扩展为古兽,再扩展为博古图案、人物、翎毛、鸟兽、鱼虫等多种类型。收藏有精美雕工的印钮的老印石,其投资收藏潜力巨大。

明清时期还出现许多印钮巨匠。杨璇的印钮,突出古兽的神态与情趣,生动毕肖。周彬的印钮,重在表现古兽特征,还侧重雕饰清新雅丽的纹饰博古图案,所制印章华茂、清灵,人称“尚均钮”。高兆在《观石录》中评:“杨璇作钮者,八九韩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磐薄尽致,出色绘事”。清朝各代君王喜爱寿山石印章,寿山印钮技术不断完善。乾隆、嘉庆年间,名师有奕天、妙香等;道光年间有薛文藻、陈德兹等。

在东、西门派鼎立的同治、光绪年间,印钮技艺飞速发展。西门派创始人潘玉茂及其弟子林文宝、陈可观、陈可锐等因材施艺,刀法浑化,追求韵味,所制印钮古意盎然,耐人寻味;而东门派艺人林谦培、林元珠及其后继者周宝庭、林寿堪

等注重发挥天然石色,运刀矫健,近现代又有林清卿、林文举等,所制印钮典雅轻盈、精巧华丽,令人惜爱。

印钮雕饰视所择印章形制而定:一是开料,又称“解石”,即将原石锯成章坯。《观石录》载:“石质厥润,锯行间则热,行久迫留燥则裂,解法,‘水解’为上。锯行时,一人提水壶。徐倾灌之”。章坯形成后要“过砖”,就是将印坯磨平磨光。二是“相石”。印钮雕刻的成败,关键在于“相石”。印章有四面,首先要确定其朝向,俗称:“朝面、立向”。钮头的设计应充分发挥石质的特色,注意印顶石料瑕疵的掩盖处理。钮雕的图像设计要与印章整体高度成比例;通常为整颗印章的三分之一。

印钮雕制有自然台和平台两种。自然台的雕法多是因章端不规则而采取的权宜之法,布局随意,追求天然石形之美;平台者则较讲究,刻钮之前先起台,在平台上雕刻,平台之下,则保持方正无缺。平台上或雕鸟兽、或人物、或瓜果、或吉祥物,创作者因形、色、巧,作品效果必古朴、端庄、尊贵。雕刻程序为:首先起台,再则挫型,三凿坯,四修光。雕刻时发现钮头石质有裂纹、瑕疵等,可结合薄意等其他雕刻方法加以化解,使作品尽可能完美。



印钮的雕刻题材很多,主要有古兽、动物、昆虫、人物、花果、博古等。古兽钮是寿山石印章的常见钮式。古兽多选自古代神话中的猛兽、奇兽、怪兽。以狮和螭虎为主。此外有龙、凤、夔、角端、辟邪、饕餮、天禄、麒麟、鳌鱼等。动物钮,动物主要为家畜类的牛、马、猪、羊、狗等,后扩充为“十二生肖”和其他鸟类。昆虫钮,常见的有鲤鱼、金鱼、螃蟹、蜘蛛、蜜蜂、蝴蝶、甲虫和蚕、蝉等。人物钮,古代印章少见人物钮,现在多有刻制。主要为弥勒、罗汉、寿星、八仙、刘海、和合二仙等,也有人物与兽类相结合的,如神仙骑兽和刘海戏蟾等。花果钮也是新兴的一种钮式图案,可充分发挥石质的“俏色”,富有生命气息。

印章“三美”,指印面篆刻美、印钮雕刻美及印材美。印章的价值体现,就要具备“三美”的特征。印钮雕工也是影响其价值的一大重要因素。在印钮发展的历史上,名家辈出,名家精良的雕工,就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高台荣光万古存

钱国宏

红色记忆

高台烈士陵园位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境内。走进烈士陵园,迎面映入眼帘的是朱德总司令题写的“烈士陵园”四个大字。陵园正门背面,镌刻着郭沫若亲笔所题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正门南北两侧,分别坐落着烈士董振堂和杨克明的汉白玉雕像。

进入大门,南北两侧各有一座三檐双层五角纪念亭,亭四周的板壁上刻有烈士诗抄、长征组画等屏幅。穿过由松柏、花圃夹道的百米水泥通道前行,便来到了烈士纪念馆。馆内以“理想高于天、热血铸祁连”为主题,布设了“序厅”“西渡黄河,执行宁夏计划”“建立永昌、山丹根据地,策应河东红军”“血战高台、临泽”“石窝分兵,余部进疆”“全力营救,保存火种”“忠心耿耿,铁骨铮铮”“光照千秋,永载史册”等展厅和1个影视厅等,采用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陈列方式,全方位地介绍了西路军征战河西的重要史实。馆内还收藏、陈列着200多件当年西路军将士用过的物品:董振堂和杨克明用过的书籍,红军将士用过的海螺号、马褥子、褡裢、砂锅、被单、皮衣、竖柜等革命文物。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两万多人

奉命组成“西路军”,从靖远虎豹口渡黄河,经景泰、永昌、山丹,于12月下旬到达张掖一带。1936年的最后一天,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红五军进入临泽县城。1937年元旦拂晓,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3千将士攻克高台城,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就在红三十军进驻倪家营、红九军攻占沙河一线,红五军攻克高台之际,西路军接到中央军委“时局复杂,西路军就地待命,开展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此时,在一条山、古浪、四十里堡受西路军重大打击的敌军又集结其100师、骑五师等正规军2万余人,并调集青海湟中、湟源、循化、化隆、大通、祁连、乐都、同仁和甘肃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的20多个团,共6万余人,兵分两路向西路军扑来。

敌人用部分兵力切断高台、临泽的联系,并分割包围、钳制沙河、倪家营主力,集中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四个骑兵旅和炮兵团、特务团以及大通陈嘉禾民团、马德胜民团、马兆瑞民团等计2万余兵力,全力围攻红五军。从1937年1月12日起,敌人采取拉大网分层逐渐收缩包围圈的办法向高台城逼近。

高台县城东西两面各有一座高于城墙的小店,居高临下,俯瞰高台县城。红五军扼守两处制高点,

筑碉堡以拱卫全城:西北角上的碉堡由三十九团的一个加强排防守,东关外的大碉堡由四十五团的一个连防守。1月15日,敌人两个营在炮火掩护下,向财神楼连续发动进攻,我军将士用机枪、步枪、手榴弹和石块,不断打退敌人的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四天,我军歼敌600多人。但红五军也伤亡巨大,且弹药将尽。1月20日晨,敌人集中全部兵力,用大海战术四面硬攻城,红五军将士们用刺刀、枪托拼杀,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20日,下午四五时,高台城陷落:除个别人员突围外,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满怀深情地称赞董振堂同志为“坚决革命的同盟”。朱德同志为烈士题词:“伟大革命先驱的事迹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叶剑英元帅赋诗:“英雄战死疆场上,今日独忆董振堂。悬崖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用以专门纪念董振堂和红五军牺牲的将士们。2009年9月14日,董振堂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